

教宗本笃十六世

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讲解的教理

保禄六世礼堂

2008年7月2日

圣保禄 (1)

宗教文化环境

各位亲爱的兄弟姐妹，

今日我会开始一个新的教理讲授周期，并将这个周期献给伟大的圣保禄宗徒。正如你们所知，我们将今年，即从2008年6月29日圣伯多禄和圣保禄的礼仪庆节，至2009年的同一个节日，奉献给保禄。保禄宗徒，他那个伟大和几乎举世无双，却又同时具有鼓舞性的形像，除了给我们树立了向人类和它的不同文化开放的表样外，也给了我们一个完全献身于主和祂的教会的榜样。因此，不只在我们的敬礼中，包括在设法理解他想对我们，今日的基督徒，要说的话这事上，他都应该占有一个特别的位置。在今日我们这个首次聚会中，我们会以保禄所生活和工作的这个时代的环境为主题。乍听起来，这样的主题似乎会将我们带离我们的时代，因为这表示我们要回到两千年前的世界。然而，表面上似乎是这样，或至少只是部份而已。因为，正如我们之后可以证明，今日的社会文化情况，在很多方面，与圣保禄生活的那个年代，并没有太大的分别。

其中要注意的最重要和最基本的一点，是有关保禄出生和成长的环境，和他之后生活于其中的那个整个大环境之间的关系。保禄来自一个肯定是属于少数人，却又非常明确和界线分明的文化，即是以色列民族和它的传统。正如在这方面有研究的学者告诉我们的，生活于那个古代世界，而又同时在罗马帝国的版图内的希伯来人，应该占整体人口的百分之十；至于在罗马这里，直至第一世纪中叶，他们更是人数很少的一群，

最多只占全城居民人数的百份之三。纵然这样，基于他们的信仰和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把自己和四周的环境清楚区别出来；这可能带来两种后果：或是嘲弄，并由嘲弄引致不容忍；或是赞赏，这赞赏以不同方式的友善态度显示出来，譬如视他们为「敬畏神的人」或「皈依者」，是一些参加会堂的聚会和分享对以色列的神的信仰的外教徒。就这种双重态度的具体例子，一方面，我们可以引用一位雄辩家，西塞罗(Marco Tullio Cicerone)，对他们的尖刻批评，他看不起希伯来人的宗教，甚至看不起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参看《为范高辩护 *Pro Flacco*》66-69)，另一方面，罗马皇帝尼罗的妻子普碧雅(Poppea)的态度，则被著名的希伯来史家华韦翱(Flavio Giuseppe)，视为对犹太人同情友善的态度(参看《犹太古代史 *Antichità giudaiche*》20,195.252;《传记 *Vita*》16)。当然尚有不可不提的，是我们从华韦翱传下来的数据得知，很早之前，凯撒大帝已经正式承认犹太人的一些特别权利(参看《同上》14,200-216)。当然，就好像今日的情况一样，那时绝大部份的希伯来人，都不在以色列的土地上，即是在那个其它人称为巴勒斯坦的地区内生活，而是散居世界各处。

因此，对于保禄自己也曾经成为上面提及的，这种对犹太人的双重和相对的态度对象，一些都不用奇怪。可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在当时罗马那个一令风行全帝国的政治体系内，犹太人带着他们的特殊文化和宗教，可以平安地生活。相反，对那些因为信仰而跟随纳匝肋人耶稣的团体，不论他们是希伯来人或外邦人，由于他们和犹太主义或罗马帝国的异教主义，都不一样，他们的情况将会困难和痛苦得多。然而无论如何，有两个因素对保禄的工作相当有利。第一个是希腊文化，自亚历山大大帝之后，至少在地中海以东及中东一带，希腊文化不但成为这一带的人的共同产业，也同时吸收了很多属于犹太人和蛮族的传统的文化元素，成为自己的文化的一部份。就这一事，当时有位作家证实说，亚历山大大帝曾「下令，所有人都要视整个所居地为自己的国家，因此再没有希腊人和野蛮人的分别」(浦鲁塔克，《论亚历山大大帝的一生或功绩》§§ 6.8: Plutarco, *De Alexandri Magni fortuna aut virtute*, §§ 6.8)。第二个因素是罗马帝国的政治管理构架，这构架不但史无前例地，统一了从不列颠至埃及南部那一大片土地，还保证了这整个地区的稳定与和平。在这片广阔的疆土上，由于罗马人那异常优良的道路系统设施，大家可以有足够的自由安全地活动，并且每到一地，即可以找到该地的文化特色，避免了这些地方性价值的消失，因为它们已成为使不同地区

统一起来的希腊文化和罗马政制的一部份。就这一点，与保禄同时代的希伯来哲学家斐朗尼 (Filone Alessandrino)，对罗马皇帝奥古斯都曾称赞不已，因为「他令到所有蛮族可以和睦地一起生活……他使自己成为和平的守护者」(《派遣往见喀利古拉皇帝的使节 *Legatio ad Caium*》 §§146-147)。

圣保禄，或至少在大马士革事件之后成为基督徒的保禄，所拥有的那个典型个人特性，即是他的普世性视野，可以肯定是产生自他对基督的信德给他带来的感动，对他来说，复活基督的形像，已经高高地凌驾于任何一种狭窄的特殊性之上；事实上，对我们这位宗徒来说，已「不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奴隶或自由人，男人或女人，因为你们众人在基督内已成了一个」(迦 3:28)。纵然这样，他所生活的年代和环境的历史文化情况，对他的选择和工作不可能没有影响。有些人基于他的犹太出身，他的希腊语言，和他的罗马公民(«*civis romanus*»)特权，一如他名字的拉丁根源所显示的，将保禄定界为「属于三种文化的人」。另外也要特别注意斯多葛派 (*filosofia stoica*)，这个在保禄年代的主流哲学派系。这哲学派系，虽然只是边缘性地，也多少影响了基督教。关于这一点，我们当然不能不提及一些斯多葛派哲学家的名字，例如其始创者季诺(Zenone)和祁安泰 (Cleante)，及之后在时序上较为接近保禄所生活的年代的塞尼卡 (Seneca)，穆苏尼 (Musonio) 和艾匹克蒂塔 (Epitteto)：在他们身上，可以找到极高的人道方面和知识方面的价值，这些价值之后自然都被吸收到基督宗教内。正如一位在这方面有研究的学者所写的，「斯多葛派……宣扬一种新的观念，这观念要求人要履行对他的同类的责任，但同时又使人摆脱一切肉体和国家民族方面的束缚，令到他成为一个纯灵性的存有」(普连思《斯多葛派》[M. Pohlenz, *La Stoa*, I, Firenze ²1978, pagg. 565s])。比方，可以想到这学派将宇宙理解为一个巨大和谐的身体这学说，之后从这学说再引伸出另一个学说：所有人，不分社会阶层，不分男女，一律平等，起码从平等原则看是这样。然后还有他们对节约，行止有度，约束自我以避免任可过度等观念。当保禄给斐理伯人写：「凡是真实的，凡是高尚的，凡是正义的，凡是可爱的，凡是荣誉的，不管是美德，不管是称誉，这一切你们都该思念」(斐 4:8)。保禄所写的，正是重复斯多葛派哲学特有的一种纯人道观念。

在圣保禄的年代，传统的宗教，至少这宗教的神话部份及与人民有关的部份，正处于危机中。早于一个世纪前，在留克利希亚斯(Lucrezio)指称「正是他们的宗教引至很多恶事的产生」(《论事物的本质 *De rerum natura*》1,101)之后，其中一位哲学家塞尼卡，他破除一切表面的礼节藩篱，教导人说「天主就在你左右，祂和你一起，祂就在你内」(《致鲁持理书 *Lettere a Lucilio*》41,1)。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保禄的宣讲中，当保禄在雅典的亚勒约帕哥，向一群伊壁鸠鲁派和斯多葛派哲学家讲话时，他引用原文直说「天主不住在人手所建的殿宇……因为我们生活、行动、存在，都在祂内」(宗 17:24.28)。藉着这些话，保禄固然反映了犹太人对那位没有任何人类言辞能表白的天主的信仰，可是他也同时带出他的听众都清楚认识的一道宗教潮。此外，我们也要注意一点，由于城中政府的庙宇不许外教徒进入举行敬礼，于是很多外教徒改到私人地点举行，这更有利于他们向他们的成员传授教义。所以，对于基督徒也是在信友的私宅中举行他们的聚会 (*le ekklesíai*)，保禄的书信在这方面的记载最多，一点都不用奇怪。况且，那时此类让公众集会的建筑物亦尚未出现。故此，基督徒的聚会在当时的人的眼中，只不过是他们最私人的一种宗教仪节而已。然而无论如何，我们绝对不能轻视对存在于外教徒和基督徒的敬礼之间的区别，因为这不但牵涉到参与者内心信仰的认同，也涉及男性和女性可以一起参与「主的晚餐」的举行，和圣经的诵读这个事实。

总括而言，从这个对基督徒时代第一个世纪的文化环境的简单介绍，已清楚展现出，除非将保禄置于他当时所生活的犹太和外教环境中，不可能对他有一个适切的认识。而且这样一来，也立即让他成为一个充满理想，活生生的历史人物，显示出在面对当时的环境时，保禄在认同中却又不乏他个人特有的原创性。因此甚至从整个基督宗教的历史来看，保禄都是最重要的模范，我们所有人，尚有很多事情要向他学习。这亦正是保禄年的目的：向保禄学习，学习信德，学习基督，最后学习正直生活的途径。